

第五輯

名山縣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名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名山县文史资料

第 五 辑

71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名山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名山县竞选国大代表始末	王加富 (1)
对民国时期抽签征兵的回忆	杨国钧 聂德林 (6)
抗战期间名山组织的自愿兵团	吴洪武 (9)
名山第一辆合资联营汽车	王 智 (12)
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王加富 (15)
我所了解的名山酱园房	王 智 (20)
名山“良友化学工业社”始末	马士俊 (23)
解放前名山民众食盐情况	周玉金 (26)
我所知道的名山哥老会	张国锦 (29)
鸦片烟在名山泛滥情况	张文鹏 (34)
民国时期名山的丐头	张文鹏 (38)
解放前名山的婚姻习俗	赵春林 刘永春 (43)
胡百川其人	胡本泽 (48)
我出任万古乡长和枪毙匪首杨月清经过	杨国钧 (61)
川剧在名山的兴起	聂德林 (65)

解放前川剧艺人生活拾零……………聂德林 (71)

民国时期黑社会的一角

携巨款出远门险遭不幸……………王 智 (78)

回娘家探亲人被捆“肥猪”……………王 智 (79)

亲生子杀老父逍遥法外……………韩光堂 口述 (81)

质疑·补正

对《人间何处不青山》一文的补正……………赵钟鼎 (83)

名山县竞选国大代表始末

王加富 整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标榜“还政于民”，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次年，3月31日，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6月13日，为适应选举国大代表需要，国民党中央成立了“选举总事务所”。

民国三十六年（1947），有关消息传入我县，街头巷尾，众说纷纭，在酝酿“国大代表”候选名单中，参选者明争暗斗，八方奔走，甚至请客送礼，封官许愿，演出了一系列丑闻。

接着，奉令成立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名山县选举事务所，由县长朱轩照兼任该所主任，所属乡（镇）则根据地盘大小，划分为若干选区，进行选民登记，填发选民证。每个选区都由县选举事务所派出监选主任和监选员，选民届时凭证到指定地点参选。同时，由各乡（镇）提名，经上级批准产生司选主任、监票员和计票员，具体管理当地的选举事宜。对不识字的选民，由指定的代笔人帮助填写选票。

竞选“国大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或“合法友党”的党员。经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必须有五百人以上联名签署提名，方为有效。经历党派之间的争夺，地方势力的较量，最后确定张秉升、张国运、胡贵德、朱廉泉四人为名山县竞选“国大代表”的候选人。按规定我

~ 1 ~

县系50万人口以下小县，只能产生一名代表。

张秉升（毅耀），名山城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生，曾任四川省警察厅长，川军第二十八军十四混成旅长，省参议员。当时，客居成都黄瓦街，有刘文辉、邓锡候等保定系同学为后盾，受县长朱轩照、驻军团长毛国懋支持。张氏家族财大气粗，积极为之奔走活动。

张国运（广德），名山永兴乡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五期炮科生，曾任江苏省松属十县督导员。杭州市公安分局长，丰都县长。系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受四川省党部曾扩情支持，本乡各界人士赞助，当时县政府的公务人员中，永兴籍人民遍及民、财、建、教各科，故对永兴有“西区国”、“西区政府”之称，（因民国初年，永兴为西一区），县长朱轩照曾企图扣压张国运的候选人材料，终未能如愿。

胡贵德（尊甫），名山城东镇人，时任国民党名山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得基层党政组织和教育界人士的支助。胡氏乃“书香”门第，其父胡存琮曾东渡留学，主修《名山县志》，世交、故旧、亲朋甚多，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朱廉泉（锦文），名山城人，民社党筹备委员。早年曾任团防局长，城西镇长等职，时已年老居家赋闲。

在竞选活动中，大家都印发了“竞选声明”在城乡广为张贴和散发，大体内容包括个人简历、政治主张以及今后如何为桑梓父老尽职等，言词诚恳、慷慨激昂。在短兵相接的角逐中，二张可算旗鼓相当的劲敌。胡虽亲友甚多，活动频繁，但其实力和社会关系均比二张逊色。朱只能是挂名而

已，充当了陪“太子”攻书的角色。所以，社会人士针对他们的特点，形象而又简练地概括为张秉升的“面子”（他在士绅中的声望高，官场上的来头大，面子大）；张国运的“票子”（他在竞选中设宴招待，请客送礼，舍得花钱）；胡贵德的“点子”（语带双关，一是讽刺他脸上有麻子，二是指他在基层的联络点多）；朱廉泉的“胡子”（因本人长须洒胸，此次竞选可能象胡子一样，只能起到陪衬和摆设作用）。

张国运明知张秉升上下有人，实力雄厚，但也看出由于他身居异地，可能鞭长莫及。因而，为了击败对手，采用了以下手段：

一、尾随监视。朱县长为了向上交差，曾随带有关人员分赴各乡，宣讲有关选举事项，暗中为张秉升拉票。张国运知道这一用意后，每处都派人尾随其后，使朱的活动受到阻挠。朱有时曾抱怨：省政府责令我要支持张秉升，这个“天牌”打着我这个“地牌”，我这个“地牌”照样打着下一级的“人牌”，这样层层打下去，张秉升才有希望。但由于有人尾随跟踪，从中掣肘，虽劳神费力，仍收效甚微。

二、重点安桩。张国运除在各地派出一些人坐桩拉票，探听虚实外，还委托本乡罗鹤鸣等人到新店乡去通过教育界杨文杰、柯吕明等沟通公私两方人员拆张秉升的台。到了选期，当地驻军代理连长何俊派出便衣手枪队监视了选场设立的各代笔处，硬要在选票上填写张秉升，罗见此情景，马上采取相应对策，即对袍哥码头上的梁海丰，柯占臣等各人赠大烟二两，乡保人员，各送法币5万元，并许以为学校购置篮

球、乒乓等体育用品，望能从中暗助。所以，一待便衣队放松了监视，代笔人便借机制造混乱，乱涂滥改，出现了许多废票。

三、酒肉款待。张国运参加此次竞选，不惜花费钱财，曾卖掉良田百余石，经常设宴招待各地助选人员，包括朱县长的亲信在内。同时，大办“九大碗”款待乡民，凡勛一票之力的均来者不误。席间，他亲自递烟斟酒，笑脸相陪，卑躬自谦，婉言陈词，自称“小弟不才，忝列国大候选人之一，如蒙不弃，他日必为地方负责，为诸公效劳……。”一时颇得民众好感，因而私下有人摆谈：今后我们有事，还可求他帮忙，茶水总妥喝他一杯嘛！如果到成都去找张旅长，那个还认得你几爷子啊。

四、笼络人心。张国运探知新店子花池子陈某青年有为，并有一定的活动能力，现囚于邛崃狱中，便亲笔向该县的县长去函，略云：“县座仁兄钧鉴：兹有敝亲陈某，年幼无知，误走岐途。理应依法处置，但彼此非外，故敢冒言，尚希法外施仁，网开一面，宥释回家，为择日完娶故也。日后如有应讯之处，小弟担保随传随到”。数日后，陈某果然被释返家，为其游说拉票，自当倍加卖力。

各选区投票选举结束后，由监票员护送，将票箱由武装人员押送回县，由县长兼选举事务所主任朱轩照主持，在戒备森严的县政府大堂当众唱票。选举结果：张运国得18581票；张秉升得18493票；胡贵德得14184票；朱廉泉得135票。由张国运当选为中华民国四川省名山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助兴者大放鞭炮，为之喝彩，徐中齐、贺

衷寒也来信恭贺。张国运以88票当选后，趾高气扬地领取了当选证，积极准备赴京开会。张秉升闻讯则耿耿于怀，一方面支使郑明星（东南）等人及丰都旅省同乡会人员向四川省高等法院指控张国运曾因贪污褫夺公权，尚未期满，请予撤销候选人资格；一方面暗示余崇光等人以当选人不符合条件，向高等法院提出应依次由张秉升递补任国大代表。高等法院开庭辩论，被告张国运既未出庭陈述，又未提交答辩书状，因而判决张国运的代表资格无效”。

张国运失去代表资格后，不仅赴会无望，且有缉捕之虞，便在外地逗留，以观其变，但拒不交出当选证。张秉升虽由官方认可，但手续不够完备，也无法前往参选。所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代表大会，名山县无代表出席，依法作弃权处理。为此，社会上曾流传两句顺口溜，生动地描绘了这场竞选闹剧的结局：“一个狐（胡）狸一个猪（朱），两个獐（张）子气得哭”。

笔者阅历浅薄，文笔拙劣。在收集整理材料中，难免有误，甚至情节有悖。但为了积累一鳞半爪文史资料，故不避其嫌抛砖引玉，投石激浪，旨在勾起各界人士回忆，写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宝贵材料，为桑梓建设尽力。

注：本文有关材料引自四川档案馆、名山县公安局、县志办公室和罗鹤鸣等口碑。

对民国时期抽签征兵的回忆

杨国钧 聂德林

民国时期，征兵的种类很多，能忆及的有募兵制、摊派制。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组织过“义勇军”、“青年远征军”、“自愿兵团”。自愿从军吃粮的人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饥寒交迫，衣食无着者；二是因私仇、私怨，杀了人，放火烧了他人房屋，为逃罪责，一走了之；三是躲避债务；四是在部队士官中有亲朋好友，为找出路而投军的。也有少数游手好闲，打牌掷骰，提劲打靶者去当“太爷”兵的。当然，也有相当热血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赴汤蹈火的。如“卢沟桥事变”后，我县由刘升甫任团长组织的“自愿兵团”，这些将士，包括许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日战场上，为民族而战，为正义而战，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国民党士兵中，多数还是强迫服役的。当时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杂牌军，各自为扩充地盘，保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在民间抓丁，加之部队待遇差，虐杀士兵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国民怨声载道，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抽丁。

一九四〇年秋，国民党当局通令实行抽签法，试图用抽签这种貌似公允的办法来扩充兵源，解除民众对抓丁（摊派）的不满。所谓抽签法，即按乡把应征对象的名字写在签上，当场抽验，中签者自行服役。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实施这种办法后，下面仍然我行我素，徇私舞弊，把种种

灾难一并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一九四三年，我县为了实施抽签法，设国民兵团进行征兵，由县长卢荣先兼任团长，副团长由中校李雯清担任，少校团附由杨国均、石九成担任，下面还委有附官、书记官等职。国民兵团成立后，在各乡（镇）调集乡队副、保队副两百余人，举办了一期为时四十天的训练班，学习内容有关兵役法，国民兵团职责及如何实施抽签法等，结业后各返回乡开展征兵。这些人员返乡后，第一步是摸底，弄清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应征壮丁人数，第二步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病残不计），把符合应征年龄的人数编造成册上报团部和县政府，第三步将应征人员在花名册上编号，最后由国民兵团统一制签。同年九月，征兵大会在县参议会（原城隍庙处）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正、副参议长罗春普、陈华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胡尊甫以及驻军首脑，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各乡（镇）长，国民兵团成员，约六、七十人。大会在大讲一通抽签法的好处和各乡名额分配后，宣布抽签开始，顺次被叫出的乡长，走到讲台，下，监察员当众翻出该乡的适龄壮丁人数，并从一号起拿出同等的编有号码的签装入签筒，摇动后，由乡长面向会场，背朝签筒，反手按分配壮丁的人数把签抽出来，交监察员唱、记签员登记。后经县长盖章，国民兵团按乡密封，派专取人员分送到乡，交乡长当众开封，照签要人。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签票到乡、保后花样百出，有的因裙带关系，将中签的亲族放走，上报壮丁“潜逃”；有的移花接木，将签票改换他人；有的用金钱雇人顶替，更多

的是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干着买卖壮丁的勾当，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如永兴乡三保布商杨尚孝中签后，在赶名山场途中被该保保长抓住，杨生意做得红火，头脑灵活，当即以全部布匹相送，得以宽免并嘱其远避。为了交差，这个保长又用了五斗米在雅安凤鸣找了一个姓李的兵贩子去顶替。这个乡的单丁宋锡如，不在应征范围内，只因家境贫寒，为人厚道，无有靠山，结果被强行服役，其妻韩氏只得将四个子女送入，忧疾而终。在实施抽签法的过程中，明争暗斗，互相攻讦，动刀动枪的事也时有发生。永兴乡中签壮丁代述云，为逃避当兵，托人说情，躲进了联保主任徐联芬家帮长工，保长郑廷辉年轻好胜，不知深浅，硬要到徐家要人，一日，郑探知代在为徐家看水碾，便亲率队丁前往抓人。这种打狗欺主的作法，在当时是十分忌讳的，徐联芬恼怒之下，为了挽回面子，不惜通过乃兄县参议员徐联选，打通驻军关节，诬郑廷辉为匪首，由警察队长杨绍溥将郑缉拿，当日毙于龚坪。事后，群众讽刺说：“抱大腿，中签壮丁免兵役，逞豪强，保长无幸遭横祸”。

被征壮丁，大都五花大绑押送到集结地，一般都关在庙内或富绅家的四合院内，四周有岗哨昼夜值勤，拉屎拉尿都得喊报告。换上军装正式成为兵后，也常受饥寒和鞭打之苦，因此，抵制、逃避服兵役的斗争一直没有断过。比较盛行的办法是躲藏，或藏入亲友处，或躲进深山老林，或远走高飞，有的还到学校读书，寻求保护。也有不少穷苦百姓被逼为匪的。由于遭到社会各方面的抵制，一九四四年德光坪（今名山茶厂）曾发生一起壮丁轰营事件，入营壮丁以赌博为由，故意发生争吵，撕打，轰出营外逃散，守卫士兵阻挡不及，开枪击伤三人，逃跑十六人，事件发生后全城哗然，接兵连一陈姓连长受到申斥。

抗战期间名山組織的自願兵团

吳洪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增加兵员，曾颁布法令：“凡能组建一个自願兵团的县，三年内免去征兵任务”，这一法令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我县为了实施这一法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由县政府委派黄埔炮科毕业生、赋闲军官、“进社”袍哥舵把子刘升甫组织“名山自願兵团”。刘对这一差使十分有兴趣，他对身边的人讲：凡能凑一个排的当排长，一个连的当连长，一个营的当营长。要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快把人马集中起来。为此，不少人十分卖力，短短十多天，就拼凑了四百多人，尽管离一个团的编制尚差很远，刘升甫还是充任了团长，张铁夫、×××等二人为副团长。全团设三个营，一营营长王洪基，二营营长王本仁，三营营长蔡子俊，共计十二个连，实际有的连队为虚构，如三营十连一个人都没有。队伍开赴邛崃后，正式命名为“建南师管区补充第二团”。同年八月底，由邛崃转青神，再到丹棱进行训练。这时由于编制不足，缺额过大，为了应付检查，只好造假名册搪塞上级，上面来点名时，不得已只好出钱请人应卯。

为了凑足一个团的编制，团部在集训时期，又要求各连派人回县继续招募兵员，到腊月底总计共有了一千多人，集结的第一站是重庆。于是大家徒步向目的地进发，时值严冬，给养困难，不少人离家后不服水土，病号逐渐增多，时

有死人，加之恋家，沿途都有逃跑，到达重庆后部队已疲劳不堪。次年二月，部队从重庆出发，目的地为湖北宜昌，这时大家已经坐上了轮船，由于旅途病号得不到及时治疗，在重庆到忠县途中死了一些人，结果被抛入江中，尸体随波逐流，引起大家愤慨。到万县后，船上又死了三十多人，团部正妻如法泡制，士兵们见状，立即抗议，为防哗变，经交涉，最后由万县红十字会接收埋葬。整个部队到达宜昌时病死、逃亡三百多人，余下的有相当部份为老、弱、病、残，根本上不了前线。有鉴于此，上峰决定对这个团进行缩编，所有军官降级使用，团长刘升甫被降为营长，营长降为连长，连长降为排长，多数军官见状都提出不干了，返回了名山。所剩八百余人，除留情壮外全支遣回了原籍。

国民党政权颁布的组织自愿兵团后“三年不征兵”的许诺实际是一个骗局。据有关材料记载，我县此后的征兵有增无减，民国二十九年为三百八十一名，三十年为五百二十四名，三十一年为六百四十三名，三十二年为八百二十五名，三十三年还征集了青年远征军五十八人，至民国三十六年止，共征集三千七百九十九名。在征兵的过程中，当局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独子也抽，未满十八岁的也抽。有太平乡（今红星乡）农民刘光明，为逃服役，用菜刀剁去右手食指。县城靠卖油糕为生的孤儿陈荣贵，年仅十五岁，被抓来罩在一口大铁钟下，整整饿了两天的，后被绳索捆至城郊德光坪集中。

广大青壮被征入伍后，国民党政权曾先后颁布了一些“条例”、“办法”、“细则”，规定对抗属、伤亡官兵、复员军人实行优待、抚恤、救济，实际是纸上谈兵，如城东

镇十一保王牟氏，其子抗战三年，优待谷一粒未拿到。抗战返籍的赵青云、杨国才、杨海轩、杨维才、张侠义于民国三十五年给县长刘启煌的报告中称：“查历年发放优待谷，士等亲属多未承领”。永兴乡十保李泽民在给县长的报告中讲：“抗战八年，身经百战，负伤数次。日本投降，部队由郑州复员还乡，双亲去世，两弟阵亡，妻室另嫁，小女于归，现茕茕孑立，伶仃孤苦，请予优待”。这一愚弄人民的作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有一对联对当时的时弊给了无情鞭答。

战士流血，一滴血，两滴血，满腔热血；

优抚加圈，三个圈，四个圈，等于圈圈。

（根据陈思邹、陈荣贵等人口碑整理）

名山第一輛合資联营汽車

王 智

解放前，名山有一条雅安至成都的碎石公路横贯全境，这条线在三、四十年代坑槽密布，偶有军车通行，一般车辆到邛崃就止步了。那时的交通运输主要是肩挑、背背，需长途运输者多用鸡公车和大板车。板车载重量大，能长途跋涉，但要四、五个人才拉得动，往返一趟成都至少要两个车子结伴而行，上坡时大家打对，来回需半月左右。如车子在路上抛锚，车夫被抓丁，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四年，我家已拥有丝烟（水烟）作坊，新开办的酱园房和祖父留下的“天恩店”（旅馆），在交通闭塞，经济不发达的名山也算小有名气了。当时最感不便的是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同时亦无银行汇兑货款，出门进货需携款步行，家中丝烟作坊常因此停工待料，故萌发了买汽车的念头。

一九四五年，名山、天全、芦山、宝兴的黄豆丰收，市场饱和，价格下跌，而成都市场销路好，拟购车后贩运黄豆，大干一场。时值东街经营土杂生意的袁明升、龚升荣也常往返于成雅线上，同感交通不便，难图发展，共同的遭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商定合资买车。同年十月，经人介绍在成都买了一辆新疆西北公司阎治鸣的小万国牌汽车，八成新，载重量为二吨半，价款一万二千元（法币），我家出资一半，另一半由袁、龚二家分担。驾驶员经龚升荣介绍，雇请

了成都外东牛市口的苏俊，苏已是中年，开车多年，技术熟练，允许入了一分干股，作为对他的额外报酬。

买了汽车，黄豆生意已经过时，另辟门路又无途径，不得已加入了成都青石桥北街宋云清开设的“益元长运输行”。所谓运输行就是专揽大、小商贩的零运货物，运向客人指定的地点，对于我们入行，宋甚表欢迎。参加运输行后，货源有了保证，但路上行驶则困难重重，一是路况很糟，旅途坑坑洼洼，每行使一次都要断两、三片钢板，二是难过新津“三渡”即羊场渡口、新津南河渡口、邓公场渡口。特别是南河渡口，江宽、水深，每每到此都要排队等候，遇洪峰时期，何时过江，不得而知。更有甚者，过渡时都要给船上一些好处，南河渡口按惯例是两条纸烟，来去都是如此，如有不周，船工故意打马虎眼，纤绳松动，车就有落水的可能。故有“走尽天下路，难过新津渡”之说。三是“黄鱼”危害。这些人都是各地舵把子的“兄弟伙”、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和社会流氓，他们串通一气，常年来往于成雅线上，专做烟土生意，民间汽车成了他们免费交通工具，如果得罪这些人，不但人被打，货被抢，今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因此，每次行车都不能装够吨位，要给这些人留位子，有时为了躲避他们，只有晚上开车，即使如此，也难逃厄运。一次，我押车夜行至邛崃黄上坡，五、六个“黄鱼”从后面追来，质问为什么不停车载人？边说边把驾驶员从驾驶室拖出，举拳就要下手，我忙下车递烟，陪不是，又把他们一个个请上车才算了事。由于上述原因，行车四年，其收入仅够修车和车上的一般开支，在无红利可分的情况下，驾驶员苏俊辞职回了家。